

第七章

家庭功能对香港年轻男性在囚人士于攻击性和希望感方面的影响

麦慧明博士¹、徐梓峰先生²

¹ 惩教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

² 医院管理局临床心理学家

据香港惩教署统计，在本港成年在囚人士总人口中，21至29岁的青壮年约占五分之一，他们会被送进惩教院所，而21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囚人士会被安排前往教导所或更生中心。过往的研究较集中分析家庭关系在减少青少年男性犯罪者的攻击性和提高抗逆力方面的作用，但并没有将年轻的男性成年在囚人士纳入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认为，21至29岁的年轻人会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继续进行角色实验（Arnett, 2000）。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罪犯在亲社会能力方面表现不佳，是一种社会认知发展迟缓（Spenser, Betts & Das Gupta, 2015），这是受家庭关系的质素所影响（Gutman & Eccles, 2007）。在某程度上，家庭关系的质素可以解释到青壮年现有的问题，并如何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心理状态。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检验惩教院所中年轻男性对家庭介入的需求，藉以填补研究上的不足。



家庭对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影响

根据惩教署2019年的风险与更生需要评估及管理程序，超过45%的在囚人士被评估为在家庭领域有一些至相当的需要。现有文献显示，家庭关系与犯罪行为 and 重犯行为有关（Klinterberg, Almquist, Beijer & Rydelius, 2011）。强大的家庭支持被视为可以有效地抑制犯罪行为。数据显示，若男性在囚人士获释后的家庭关系能得到改善，这有助他降低重犯率、改善就业并减少吸毒问题（Brunton-Smith & McCarthy, 2017）。

减少愤怒、敌意和重犯

研究显示，在囚期间家庭关系较好的在囚人士，会较少出现纪律问题（Bayse, Allgood, & van Wyk, 1991; Klein, Bartholomew, & Bahr, 1999），亦较少卷入违规行为如争吵、打架或肢体暴力事件。相反，大量证据显示，早年呈现的攻击性和犯罪行为，是与家庭功能不佳有关（Farrington, 2010）。不同的研究都确立（例如 Henneberger, Varga, Moudy & Tolan, 2016; Stewart & Rapp, 2017），更紧密的家庭联系和成员之间更佳的互动，可以帮助年轻的男性在囚人士改变他们的攻击行为。许多年轻男性在囚人士在被监禁之前已面对紧张的家庭关系（Brunton-Smith & McCarthy, 2017），但由于他们在少年时间须被长期囚禁，以致无法修补家庭关系。因此，当进入成年阶段时，攻击性和纪律问题可能会持续。

家人定期探访可以改善在囚人士与家庭之间的连系力量，这样会有助减少再犯问题（Rocque, Bierie, Posick & MacKenzie, 2013），从过去犯罪记录的分析显示，这种影响十分显著（Brunton-Smith & McCarthy, 2017）。分析指，若于囚禁期间家庭关系得到改善会对在囚人士获释后的行为产生正面影响（Rocque, Bierie, Posick & MacKenzie, 2013），而鼓励重建家庭关系的惩教计划可令在囚人士摆脱攻击性和重犯行为。



希望感

是一种正向的认知

促进希望感和积极的人生观

研究发现密切和稳定的家庭关系与抗逆力有关 (Born, Chevalier, & Humblet, 1997)。由于失去个人自由和社会联系, 被囚可以带来巨大的心理困扰。因此, 在囚人士能保持希望感和积极的人生观是相当重要的。根据 Snyder (1991), **希望感是一种正向的认知, 由三个部分组成: 1) 目标; 2) 有助实现目标的策略路线; 3) 为实现目标提供动力的意志力。**研究指希望感水平较低的人更容易参与违规行为, 例如犯罪和滥用药物 (Martin & Stermac, 2010), 而对未来没有希望亦令这些犯罪行为持续。Martin和Stermac (2010) 解释, 当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选择了不适当的途径和缺乏意志力的时候, 便形成了犯罪行为。

除了维持希望感, **在囚人士还可以在囚禁期间反思他们的经历并从逆境中成长** (Joseph, 2009)。**逆境后有积极的看法可以被视为创伤后的成长**, 而消极的看法则会导致更多的消极思维, 从而导致更多的心理困扰。

本研究

本研究旨在检视改善家庭功能能否对减低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攻击性和提升他们的希望感。主要假设如下:

1. 改善家庭功能有助促进年轻男性在囚人士对前景更为积极和减少其消极想法, 从而降低他们整体的攻击性。
2. 改善家庭功能可助年轻男性在囚人士变得积极和减少消极的改变, 这将增进他们希望感的思维。

本研究的结果将为惩教院所发展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家庭为本治疗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 结果所显示的的中介机制, 可有助临床心理学家深入了解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特殊需要, 这可能成为一个治疗的切入点。

方法

参与者和程序

我们的研究通过香港惩教署的伦理审批。是次研究从香港一间男性惩教院所抽取了45名年龄介乎21至29岁间的本地男性在囚人士。于2020年6月, 研究员接触该院所中上述年龄范围内的所有男性在囚人士, 而没有采用任何排除准则。每个参与者都交回知情同意书。在决定参加研究之前, 研究员向他们简要介绍其权利和责任, 然后让同意参与者在治疗前和后完成一系列问卷。

测量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 家庭一般情况调查次量表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 General Functioning Subscale; Epstein, Bishop, & Levin, 1978)是一个包含12题的评估工具, 以分析个人的家庭功能。参与者按照李克特四级量表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得分的总和反映了家庭的整体病态状况, 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不健康。该量表是根据McMaster模式 (Epstein, Bishop & Levin, 1978) 建立。该模式认为, 家庭功能有以下六个维度: 问题解决、沟通、家庭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心理测量学研究显示, 家庭一般情况调查次量表是可靠 (Cronbach's $\alpha = 0.92$) (Epstein et al., 1983) 并且有效的 (Byles, Bryne, Boyle, & Offord, 1988)。

攻击性

攻击性量表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Buss & Perry, 1992)是用来评估参与者的攻击性。问卷有29项问题, 量度愤怒的四个面向, 即: 身体攻击 (行为方面, 例如打人、破坏东西)、言语攻击 (行为方面, 例如与他人争吵和责骂)、易怒 (情感方面, 例如, 容易生气、发脾气) 和敌意 (认知方面, 例如怀疑和嫉妒他人)。分数越高意味著情绪调节能力越弱, 攻击性亦越大。

希望感

中文版成人希望量表 (Adult Hope Scale) (Ho et al., 2010) 用于评估个人的希望感水平 (Snyder et al., 1991)。这是一个李克特八级量表的12项测量。其中四个项目构成意志力次量表, 而其他四个项目加起来给出目标策略路线次量表分数。其余四项为干扰元素题目。总希望感分数可以通过将意志力和目标策略路线次量表分数相加来计算, 这反映了本研究中的总体希望感水平。分数越高反映希望感越大。该中文版测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Cronbach's α : 意志力 = 0.70; 目标策略路线 = 0.76; Total = 0.81)

结果

观念的改变

观念改变问卷 - 简短版 (Changes in Outlook Questionnaire-Short version; Joseph, Linley, Shevlin, Goodfellow, & Butler, 2006) 评估逆境后经历的积极和消极改变。问卷由五个测量正面变化的项目 (CiOP-S) 和五个测量负面变化的项目 (CiON-S) 组成。项目采用从 (1) 非常不符合到 (6) 非常符合的六级量表进行评分, CiOP-S 和 CiON-S 的分数范围为 5 到 30。CiOP-S 和 CiON-S 分数越高表示在经历了严重的压力事件后, 正面和负面的变化越大。观念改变问卷是一个有效且可靠的测量表, 而且在危机情况下特别有用。正面和负面变化次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令人满意 (分别为 0.83 和 0.90) (Joseph et al., 2006)。CiOQ-S 由 Zang, Hunt, Cox, & Joseph (2012) 翻译成简体中文版(CiOQ-SCS)。中国地震幸存者的正面变化次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CiOP-SCS)为0.87, 负面变化次量表 (CiON-SCS) 为 0.82。此外, 在测量焦虑和抑郁时亦呈现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和聚合效度 (Zang et al., 2012)。

统计分析

本研究整理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统计的描述性数据, 并运用皮尔森相关分析以检视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员亦运用回归分析中的逐步法 (Baron & Kenny, 1986) 去建立变量之间存在中介关系的假设。索贝尔测试(Sobel, 1982) 用于检验中介关系的统计学显著性。所有统计分析均以 SPSS 23版本(IBM Corp., 2013) 进行。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

所有参与者都完成了是次研究。样本包括 45名男性在囚人士, 平均年龄为 23.18岁 (标准值 = 1.23)。他们的平均在囚时间为 80.27 个月 (标准值 = 36.94)。大多数参与者是单身 (n = 42)。在他们被囚之前, 84.5%曾从事非法工作或失业, 32名参与者曾经吸毒。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吸毒者和非吸毒者的所有问卷得分相似 (p > .05)。至于他们的家庭特徵, 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双亲家庭 (n = 32)。七名参与者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有犯罪记录。表 1 总结了他们的社会人口特徵。



表 1

在囚人士的社会人口特徵

| 参数 | 平均数 | 标准差 |
|--------|-------|-------|
| 年龄 | 23.18 | 1.23 |
| 刑期 | 80.27 | 36.94 |
| 犯罪前科数字 | 2.38 | 2.05 |
| 子女数目 | 0.11 | 0.38 |

| 参数 | n | % |
|-----------------------------|----------|----------|
| 教育程度 | | |
| 小学以下 | 0 | 0 |
| 小学 | 0 | 0 |
| 中学 | 45 | 100 |
| 大专 | 0 | 0 |
| 大专以上 | 0 | 0 |
| 就业情况 | | |
| 全职 | 4 | 8.9 |
| 兼职 | 2 | 4.4 |
| 失业 | 26 | 57.8 |
| 全职学生 | 1 | 2.2 |
| 非法工作 | 12 | 26.7 |
| 婚姻状况 | | |
| 未婚 | 42 | 93.3 |
| 已婚 | 1 | 2.2 |
| 同居 | 1 | 2.2 |
| 离婚 / 分居 | 1 | 2.2 |
| 家庭特徵 | | |
| 双亲家庭 | 32 | 71.1 |
| 单亲家庭 | 10 | 22.2 |
| 父母离世 | 3 | 6.7 |
| 有否滥药 | | |
| 有 | 32 | 71.1 |
| 否 | 13 | 28.9 |
| 参数 | n | % |
| 积犯 ^a | 4 | 8.9 |
| 初步犯罪指数类别^b | | |
| 偷窃 | 1 | 2.2 |
| 暴动 | 1 | 2.2 |
| 贩运危险药物 | 42 | 91.3 |
| 盗窃 | 1 | 2.2 |
| 普通袭击 | 1 | 2.2 |

注: M=平均数; SD=标准差。

^a 反映曾被定罪入狱的人数及百分比

^b 参与者可能干犯了1项或以上的罪行

运用皮尔森关联系数计算问卷分数中家庭功能、希望感、观念变化和攻击性所见，家庭功能评分与其他所有测量值呈弱到中度相关，水平为 $p < .05$ 。希望感总评分与观念的正面变化 ($r = 0.54, p < .05$) 和负面变化 ($r = -0.58, p < .05$) 呈中度相关。除了家庭功能外，攻击性总评分与观念的负面变化中度相关 ($r = 0.48, p < .05$)。表 2 总结是次研究的关联系数矩阵以及测量的范围、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表2
平均数，标准差及量表分数相关性

| 参数 | 平均数 | 标准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
| 1. FAD - GF | 24.56 [12 - 39] | 6.83 | | | | | | | | | | |
| 2. AHS | 47.58 [27 - 60] | 7.01 | -0.54** | | | | | | | | | |
| a. Agency | 25.07 [13 - 32] | 3.99 | -0.51** | 0.92** | | | | | | | | |
| b. Pathway | 22.51 [11 - 28] | 3.68 | -0.48** | 0.91** | 0.67** | | | | | | | |
| 3. CiOQ — 正面 | 23.71 [17 - 30] | 3.03 | -0.38** | 0.54** | 0.49** | 0.49** | | | | | | |
| 4. CiOQ — 负面 | 11.56 [5 - 22] | 3.93 | 0.48** | -0.58** | -0.46** | -0.60** | -0.55** | | | | | |
| 5. AQ | 80.58 [33 - 123] | 18.08 | 0.44** | -0.24 | -0.23 | -0.21 | -0.29 | 0.47** | | | | |
| a. 肢体侵犯 | 24.36 [9 - 43] | 6.71 | 0.36* | -0.07 | -0.09 | -0.04 | -0.17 | 0.27 | 0.91** | | | |
| b. 语言侵犯 | 15.00 [6 - 21] | 3.16 | 0.30* | -0.14 | -0.16 | -0.09 | -0.15 | 0.40** | 0.81** | 0.66** | | |
| c. 愤怒 | 17.40 [7 - 29] | 5.34 | 0.44** | -0.27 | -0.27 | -0.22 | -0.33* | 0.36* | 0.90** | 0.87** | 0.60** | |
| d. 敌对 | 23.82 [8 - 34] | 5.94 | 0.37* | -0.34* | -0.29 | -0.34* | -0.33* | 0.60** | 0.78** | 0.50** | 0.63** | 0.53** |

注。
M = 平均数；SD = 标准差。
[] 内数字指每项参与的幅度
FAD — GF = 家庭评估工具 — 普遍功能次量表；AHS = 成人希望量表；
CiOQ: 展望转变问卷；AQ: 攻击性问卷。
** 显示 $p < .01$ 。



用回归分析看中介效应

一如预期，研究结果与假设的中介效应一致，不良的家庭功能会带来观念的负面变化 ($\beta = 0.48, p = .001$)。另一方面，不良的家庭功能负向预测了观念的正面变化 ($\beta = -0.38, p = .010$)。

预测攻击性

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较弱的家庭功能可正向预测更多的攻击性 ($\beta = 0.44, p = .003$, 模型 1)。当加上观念的负面变化作为预测变量时 (模型 2)，新模型所显示的关系显著成立 (Fchange (1, 42) = 5.33, $p = .026$)。这两个预测变量占总体攻击性差异的 25.0%。此外，观念的负面变化 ($\beta = 0.34, p = .026$) 完全调节了家庭功能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 ($\beta = 0.27, p = .073$)。索贝尔检验的结果显示，上述的中介效应略微显著 ($z = 1.94, p = .052$)。

预测希望感

研究构建了三个回归分析模型，以进一步检

验观念变化对家庭功能和希望感之间的潜在中介作用。第一次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 3) 显示，家庭功能不佳与希望感呈负关联 ($\beta = -0.54, p < .001$)。当正面和负面的观念变化同时与家庭功能作为希望感的预测因素时，与原先的模型相比，两个新模型皆较显著地预测希望感 (模型 4 - 正面的观念变化: Fchange (1, 42) = 9.13, $p = .004$; 模型 5 - 负面的观念变化: Fchange (1, 42) = 9.69, $p = .003$)。

当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4，部分家庭功能与希望感之间的关系 ($\beta = -0.40, p = .003$) 被观念的正面变化 ($\beta = 0.38, p = .004$) 所影响。家庭功能和观念的正面变化占希望感变数的 39.3%。Sobel 检验的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z = -2.35, p = .019$)。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5，观念的负面变化 ($\beta = -0.41, p = .003$) 也部分调整了家庭功能与希望感之间的关系 ($\beta = -0.35, p = .013$)。这两个预测变量占希望感变数的 40%。Sobel 检验的结果显示，正向观念变化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 ($z = -2.01, p = .044$)。中介模型的统计数字见表 3。

讨论

改善家庭功能可减低攻击性并增强希望感

与我们的假设一致，研究发现男性在囚人士若有较佳的家庭功能，是减少其整体攻击性的保护因素。与之前关于青少年的研究一致，家庭关系紧张亦与攻击行为有关（Farlington, 2010）。更紧密的家庭凝聚力和成员之间更好的互动有助青少年改变他们的攻击性行为（Henneberger, Varga, Moudy & Tolan, 2016）。对于在囚人士来说，即使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家庭也可以提供资源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例如与外界保持联系，并帮助他们面对生活问题。当在囚人士能在囚禁过程中怀有较少的烦躁情绪和挫败感，便会较少依赖攻击性来解决问题。

除了减低攻击性外，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较稳定的家庭关系可以促进希望感。这些发现与现有文献一致，显示稳定的家庭关系可增强一个人在希望感上的正向认知（Born, Chevalier, & Humblet, 1997）。在被囚禁期间，在囚人士可能因为压力和沮丧，而容易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目标，甚至缺乏方法或动力去克服这困难时期。根据希望理论（Synder, 1991）——「希望是一种正面的激励状态，源于对成功规划的理解（即对目标策略路线的思考）和实现目标的能量（即对意志力的思考）」（Synder, 2002），关系紧密的家庭成员可以作为榜样，激励在囚人士确立他们的具体目标。在囚人士还可以在家人的指导下学习和练习解决问题的技巧，培养信心来执行计划，以实现目标。此外，由于家庭功能良好的成员会给予信任，在囚人士会被鼓励作出行为改变及重新调整生活目标。在家人的鼓励下，加上可实现的计划和动力，年轻的男性在囚人士将更能力在逆境中实现他们的生活目标。

改善家庭关系为改变观念提供基础

与其说是有直接关系，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认为，家庭功能和攻击性之间的联系完全由在囚人士负面的观念变化所调整。这结果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功能和希望认知之间的关系，有部分是出于观念变化而导致：功能良好的家庭可以在在囚人士的创伤事件后协助其积极成长（Tedeschi & Calhoun, 1995），并防止其进入院所后出现消极变化。

为了扩阔现有的知识基础，是次研究探索了家庭在减少在囚人士的攻击性行为，以及促进希望认知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在囚人士必须忍受长期与外界和他人分离，因此许多人视监禁为一种创伤。如果不经历从创伤中反思和寻找意义的过程，在囚人士就很难在监禁期间学习成长和改变他们的不良行为（Joseph and Linley, 2005）。这样，他们可能会重拾以往的不良生活价值观，孤立自己，并且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感到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一些在囚人士可以适应监禁的创伤并达至创伤后成长。过往的文献认为，社会支持对于遭受创伤的人成功适应逆境至关重要（Joseph & Linley, 2005; 2006）。家庭可以成为创伤后成长的催化剂，功能较好的家庭具备更多能力，在面对逆境时能坦诚地沟通和齐心解决问题。家庭可以与在囚人士一同作出所需的改变，包括改变他们的家庭文化，减少行为控制，表达他们的感情，重建他们的关系。因此，在囚人士能通过家庭满足他们对自主性、胜任感和关联性的基本心理需求（Deci & Ryan, 1985; 2000），并承认他们的违法行为和正视监禁经历。这有助在囚人士从监禁中寻找意义，并对未来保持更积极的看法。

表3

中介模型回归分析撮要

| 预测变量 | 对侵犯性问卷的直接影响 | | | 对侵犯性问卷的中介影响 | | |
|---|-------------|------|--------------|-------------|------|---------------|
| | B | SE | 95% C.I. | B | SE | 95% C.I. |
| FAD - GF | 1.16** | 0.36 | [0.43, 1.89] | 0.73 | 0.39 | [-0.07, 1.52] |
| CiOQ - 负面 | | | | 1.58* | 0.68 | [0.20, 2.96] |
| $R^2 = 0.28, F(1, 42) = 5.33, p = .026$ | | | | | | |

| 预测变量 | 对成人希望量表的直接影响 | | | 对成人希望量表的中介影响 | | |
|--|--------------|------|----------------|--------------|-------|----------------|
| | B | SE | 95% C.I. | B | SE | 95% C.I. |
| FAD - GF | -0.56** | 0.13 | [-0.82, -0.29] | -0.41** | -0.40 | [-0.67, -0.14] |
| CiOQ - 正面 | | | | 0.89** | 0.29 | [0.30, 1.48] |
| $R^2 = 0.42, F(1, 42) = 9.13, p < .01$ | | | | | | |

| 预测变量 | 对成人希望量表的直接影响 | | | 对成人希望量表的中介影响 | | |
|--|--------------|------|----------------|--------------|------|----------------|
| | B | SE | 95% C.I. | B | SE | 95% C.I. |
| FAD - GF | -0.56** | 0.13 | [-0.82, -0.29] | -0.35* | 0.14 | [-0.63, -0.08] |
| CiOQ - 负面 | | | | -0.74* | 0.24 | [-1.22, -0.26] |
| $R^2 = 0.43, F(1, 42) = 9.69, p < .01$ | | | | | | |

Note. B = 非标准化系数 SE = 非标准化系数中准标差 . 95% C. I. = 95% 系数置信区间

FAD — GF = 家庭评估工具 — 普遍功能次量表; AHS: 成人希望量表;

CiOQ — Positive = 正面展望转变次量表; CiOQ - Negative: 负面展望转变次量表;

AQ = 侵犯性问卷.

* 显示 $p < .05$; **显示 $p < .01$



创伤后的正向成长带来实际改变

是次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一个观点:一个运作良好的家庭为个人提供了一个能安全探索价值观和目标的环境 (Joseph & Linley, 2005), 从而带来实际的行为改变。当一个人对未来持更积极的看法时, 他更能找到生活和未来的意义, 反之亦然。即使他被囚禁, 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设定目标, 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去追求目标。这种逆境后的成长变成了在希望认知下路径思考的泉源 (Snyder, 2002)。这样, 尽管有障碍, 在囚人士仍会更加果断地思考实现目标的方法。例如, 为实现出狱后成为建筑工人的目标, 在囚人士可于在囚期间积极参加职业培训计划, 以学到相关的工作技能并获得认可的资格。

创伤后成长不仅鼓励个人设定更合理的目标, 亦能促进在希望认知下有更好有关意志力的思考 (Snyder, 2002)。能够从监禁中找到意义的在囚人士, 将更能够理解自身的监禁经历。他可以将他在囚的经历视为对过去不法行为的责任承担。他也可以为自己培养出信任感,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有动力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于获释后防止重犯。当他会对自己、未来和环境充满希望, 他便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也会更积极地在惩教院所中接受实务培训, 并在获释后工作。因

此, 具有正面创伤后成长的在囚人士更有能力建立和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和价值观。

在人际交往中, 一个对未来有正面看法的人会表现出对他人有更大的宽容和理解。这些特质对于减少一个人对世界和他人的敌意至关重要。他会对生活中的事件减少怨恨, 并逐渐了解到, 他可以不用暴力, 而选择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呼应, 即减少负面的观念变化有助减少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整体攻击性。

替代中介模型

在替代模型当中, 中介物 (观念的积极和消极变化) 和结果变量 (攻击性或希望感) 互相对换, 虽然在统计学上得到支持, 但在理论上找出这些另类模型是否合理也是重要。

在精神病理学研究中, 行为经常被视为结果变数。同样, 重犯行为也根据获释的更生人士的行为来定义。行为受思想影响。在攻击性量表中, 愤怒中的四个面向中有三个皆以参与者的行为和情绪表达作定义。因此, 攻击性行为能导致观念变化的替代模型, 其在理论上是不获支持的。

限制

尽管如此, 本研究的结果仍需被谨慎解读, 因为: 1/ 本研究的样本量少, 2/ 样本群体的年龄范围较窄。这两个因素都影响了本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这些关联性是否能在其他不同性别和年龄范围都仍然存疑。过往文献指出, 女性在囚人士对来自原生家庭的支持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Casey-Acevedo & Bakken, 2001)。老年人也可能较少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样本探讨家庭功能对攻击性和希望感的影响, 以提升大家对家庭介入是否能促进在囚人士再融入社会的理解。

最后, 目前的研究仅使用横断面数据来探索可能的中介元素。由于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 以致无法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未来应收集及验证观察性或介入性研究中的纵向数据, 以解决这个问题。

临床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旨在改善家庭功能和生活观念的治疗措施, 可作为减少年轻男性在囚人士的攻击性和增强希望感的治疗方法。这结果为临床心理学家在惩教院所中设计和实施家庭治疗提供了明确的方向。通过家庭治疗, 受损的家庭功能有机会于在囚期间恢复, 并为建立一个更多尊重、认可和情感支持的家庭铺路。此外, 治疗应聚焦在帮助年轻男性在囚人士, 在这逆境当中利用家庭资源培养抗逆力和促进创伤后成长, 并通过家人审视他们的人生观, 以带来行为改变和希望认知。

在实践这些计划后,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 以验证家庭功能、观念变化、攻击性和希望认知之间的中介关系。下阶段可考虑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了解在囚人士在参与此类计划期间的认知和行为变化。这些相关研究都可以令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家庭介入对在囚人士所带来的改变。

参考资料

-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Bayse, D. J., Allgood, S. M., & van Wyk, P. H. (1991). Family life education: An effective tool for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Family Relations*, 40(3), 254–257. <https://doi.org/10.2307/585008>
- Born, M., Chevalier, V., & Humblet, I. (1997). Resilience, desistance and delinquent career of adolescent offende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6), 679–694. <https://doi.org/10.1006/jado.1997.0119>
- Brunton-Smith, I., & McCarthy, D. J. (2017). The effects of offender attachment to family on re-entry outcomes: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7(2), 463–482. <https://doi.org/10.1093/bjc/azv129>
- Buss, A. H., & Perry, M. (1992).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452–45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3.3.452>
- Byles, J., Byrne, C., Boyle, M.H., & Offord, D.R. (1988). Ontario Child Health Stud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general functioning subscale of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mily Process*, 27(1), 97–104.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1988.00097.x>
- Casey-Acevedo, K. & Bakken, T. (2001). The effects of visitation on women in pri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25, 48–69. <https://doi.org/10.1080/01924036.2001.9678663>
- Deci, E.L., & Ryan, R.M. (1985). The General Causality Orientations Scale: self-determination in personal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 109–134. [https://doi.org/10.1016/0092-6566\(85\)90023-6](https://doi.org/10.1016/0092-6566(85)90023-6)
- Deci, E.L., & Ryan, R.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11(4), 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 Epstein, N.B., Bishop, D.S., & Levin, S. (1978). The 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4), 19–31. <https://doi.org/10.1111/j.1752-0606.1978.tb00537.x>
- Epstein, S. (1983). The stability of confusion: A reply to Mischel and Peake. *Psychological Review*, 90(2), 179–18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0.2.179>
- Farrington, D. P. (2010). Family influences on delinquency. In A. R. Roberts & D.W. Springer (Eds.),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p. 203–222). Sudbury: Mass, Jones, and Bartlett.
- Gutman, L. M., & Eccles, J. S. (2007). Stage–environment fit during adolescence: Trajectories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2), 522.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43.2.522>
- Henneberger, A. K., Varga, S. M., Moudy, A., & Tolan, P. H. (2016). Family functioning and high risk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Examining effects by ethnicit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1), 145–155.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4-0222-8>
- Ho, S. M.Y., Ho, J. W., Bonanno, G. A., Chu, A. T., & Chan, E. M. (2010). Hopefulness predicts resilience after hereditary colorectal cancer genetic testing: a prospective outcome trajectories study. *BMC cancer*, 10(1), 279. <https://doi.org/10.1186/1471-2407-10-279>
- IBM Corp. Released 2013. IBM SPSS Statistics for Windows, Version 22.0. Armonk, NY: IBM Corp.
- Joseph, S. (2009). Growth following adversit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Psychological Topics*, 18, 335–344.
- Joseph, S., & Linley, P.A. (2005). Positive 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n Organismic Valuing Theory of growth through advers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3), 262–280. <https://doi.org/10.1037/1089-2680.9.3.262>
- Joseph, S., Linley, P. A., Shevlin, M., Goodfellow, B., & Butler, L.D. (2006). Asses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nges in the aftermath of adversity: A short form of the Changes in Outlook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1, 85–99. <http://doi.org/10.1080/15325020500358241>
- Klein, S. R., Bartholomew, G. S., & Bahr, S. J. (1999). Family education for adults in correctional setting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43(3), 291–307.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99433004>
- Klinterberg, B., Almquist, Y., Beijer, U., & Rydelius, P. A. (2011). Family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ortality-possible mediating factor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in the Stockholm Birth Cohort. *BMC Public Health*, 11(1), 756. <https://doi.org/10.1186/1471-2458-11-756>
- Martin, K., & Stermac, L. (2010). Measuring H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4(5), 693–70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09336131>
- Rocque, M., Bierie, D. M., Posick, C., & MacKenzie, D. L. (2013). Unraveling change: Social bonds and recidivism among released offenders. *Victims & Offenders*, 8(2), 209–230.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12.755141>
- Sobel, M.E. (1982)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3, 290–321. <https://doi.org/10.2307/270723>
- Spenser, K. A., Betts, L. R., & Das Gupta, M. (2015). Deficits in Theory of Mind, empathic understanding and moral reason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young offenders and non-offenders. *Psychology, Crime & Law*, 21(7), 632–647.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X.2015.1028542>
- Snyder, C. 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 249–2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304_01
-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Holleran, S. A., Irving, L. M., Sigmon, S. T., Yoshinobu, L., Gibb, J., Langelle, C., & Harney, P. (1991).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4), 570–58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0.4.570>
- Stewart, C., & Rapp, L. (2017). The Relationship of Spirituality and Family Functioning to Recidivism: An Investigation with Incarcerated Adolescent Males. *Residential Treatment for Children & Youth*, 34:3–4, 292–310. <https://doi.org/10.1080/0886571X.2017.1370409>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5). *Trauma &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Sage Publications, Inc. <https://doi.org/10.4135/9781483326931>
- Zang, Y., Hunt, N. C., Cox, T., & Joseph, S. (2012). Short form of the Changes in Outlook Questionnaire: 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10, 41. <https://doi.org/10.1186/1477-7525-10-41>